

浅析美中关系趋于合作的因素

◆张蓓蓓 厦门大学法学院

【摘要】冷战结束以来,美中关系更趋复杂化,时而冲突,时而合作,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究竟是“围堵”还是“交往”,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有各自不同的解答,难以单纯的做出选择。本文从相互依赖理论的角度切入,分析美中关系的未来趋向,冀望寻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关键词】美中关系 合作 相互依赖

一、中美关系的传统理论观点

1 新现实主义与围堵对抗。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是当今最权威的理论工具,它们如何解读中美关系,对理论或实务均有重大的意义。“古典现实主义”标榜务实解释国际现象、搁置道德、理想主义或意识形态,以理清国家行为者的行为因素、解释国家的行为事实。认为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基础,追求权力是每个国家参与国际关系的目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将权力看成是无政府的世界中实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而是将权力本身视为一种目的。”以权力界定利益、国际无政府状态、权力平衡等主张,并点出这些“现实问题”的运作与解决模式。“新现实主义”更进一步主张理论“简约”与“系统化”的特征,将国际社会分为“个人层次”、“国内层次”、“体系层次”三者,并以后者为要。认为国内与个人层次的行为是受到整个国际体系结构的力量所型塑,其结构问题即系统权力组成与安排的问题。

这种“霸权转移”的致命危险在于,它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零和竞争。有学者指出,崛起强权必须与既有霸权争夺国际体系的主导力、支配力,既有的强权国家主导建立一套的国际秩序与规则,以求达成全球“治理”之状态,反映他们自身的利益。新崛起的强权则有其新的国际地位与声望之要求,以及其新的自身利益准则,新旧强权期望的国际秩序产生矛盾且日渐扩大,最终解决方式主要将是“霸权战争”。

这些权力结构的矛盾学说是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围堵”策略的基础。当前的美国战略被称为“建设性接触”,接触与其说是一项具体的政策不如说是一种态度,而且本身也包含着限制因素。该战略没有说明怎样处理诸如台湾、贸易或人权之类的难题。

2 新自由主义与交往合作。新自由主义者设定的国际体系特征是国际制度,虽然并未否认华尔兹的结构,仍然认为以大国间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并不仅仅如此。实际上,进程与结构一样,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此时,新自由主义强调的重心就从国际体系结构转移到国际体系进程。新自由主义论者认为,是体系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合作或冲突行为,而体系进程中最具意义的因素是国际制度。他们指出,国家是理性的,国际机制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问题的有效手段。

全球化现象下国家地位下降、非国家因素上升,“高阶政治”与“低阶政治”已难分高低先后。国际间不再是简单的政府间双边双边协商和国家间关系,而是错综复杂的“超越国家行为体”结构,亦即所谓“复合互赖关系”。

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可以提供机会,以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以及追求某些在一个仅由各国掌握他国倾向的信息和本国可支配权力资源的世界上并不可行的战略。正如允许囚徒困境中参与者相互交流将会改变博弈的性质,增进国家交流能力并达成互惠安排的系统进程是国际整体战略的补充,并改变政治后果。

据此,中美关系至少有三点理由必然采取合作交往。第一是经济因素。新自由主义者持有的是一种将经济利益摆在首要位置,或至少是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位置的国家利益观。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建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目标,巨大的中国经济急速起飞,美国有必要协助其融入此系统之中,以维护整体体系运作之稳定。

第二是安全战略因素。纵观很长一段期间内仍无法挑战美国,谈论冲突、围堵言之过早;相反的,中美的合作互利则重要许多,包括反恐、北韩、台湾、印巴、南沙、“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际犯罪等等。而中

国若是越融入世界体系,也越不容易制造国际麻烦。

“机制因素”是第三个理由。新自由主义看到了国际制度的重要性,其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内核,不仅将制度、规范等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变量。

中美关系是一种交杂着合作与对抗两大特征的复杂事实,我们很难在“交往”与“围堵”二者之间作出一个单纯的选择。于是,近年出现另一种折衷的说法——“围和策略”:既交往又围堵。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事务上与中国合作,寻求中国在限武与不扩散等方面提供协助;另一方面,美国唯系它与日、韩的军事同盟、限制对中国的军事科技出口,以“分散投资、降低风险”避免孤注一掷。然而这样的综合论点似乎仍仅在对两大竞争面向作综合陈述,犹未指明何以冷战以来美国对中国政策大体偏向“合作多于对抗”的一贯性现象。

二、布什政府的中国政策

1 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以美国“对台军售”及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为主要。2001年布什批准台湾60余亿美元的武器采购案,这被视为是为了对付中国崛起所采取围堵战略的举动。然而,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是长久以来的一贯政策,并不是布什政府的短期作为。对于后者,美国选择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放弃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并且展现在不支持台湾今年致力于加入联合国等以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这点布什同意延续了过去历任美国政府的做法。

2 外交结盟。可以从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结盟发展,来看布什政府十分借由外交手段加强了对中国的围堵。首先是美日关系。2000年布什上台后,在首度美日峰会上发表“安全和繁荣伙伴”声明重申两国关系,同年并让日本加入了战区飞弹防御计划。之后,美日实际上大体维持既有以来的架构,除了小部分修正调整,未再签定新的军事盟约,亚太地区的军事结盟未因此大有增减。

美俄的共同观点始终不及中俄多。美借反恐之由将势力插入中亚地区后,两者歧见更深。至于东南亚国家亦未有太多制衡价值,事实上东南亚国家不少立场亲中或反美干预,美国事实上很难与这些国家军事合作防堵中国。

美国与环绕中国的主要周边国家并没有特别发展出坚强、紧密的围堵阵线,其对中国的外交围堵表征并不明显。

三、结语

美国做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实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可想而知;中国是战后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廉价劳力,使得这两个大国联系紧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的关系愈加紧密。权力对抗的角力将在不伤双方表面和气的原则下,各凭本事纵横捭阖。从相互依赖理论的角度来看,尽管美中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相互合作却是大势所趋,对双方都有利,中美关系走向合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王杰. 国际机制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2] 杨士乐. 美国小布什政府对台军售之分析: 维持两岸军力平衡[J]. 问题与研究, 1992(4).

[3]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